

弥留之际的周恩来我心目中的朱德总司令

毛泽东的最后瞬间 国葬十日 王洪文的标准照

抓捕『四人帮』唐山大地震十月的喜讯



往事

—1976 写真

董保存/主编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书 名：往事

——1976 写真

主 编：董保存

出 版：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 17 号)

发 行：各地新华书店

经 销：江西科佳图书印装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850 × 1168mm 1/32

开 本：3.5

印 张：8 万

字 数：1999 年 8 月第 1 版第 4 次印刷

版 次：15001—19000

印 数：7.00 元

ISBN 7 - 80647 - 036 - 0/I·30

---

邮政编码：330002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目录

|     |                        |       |
|-----|------------------------|-------|
| 顾保孜 | 弥留之际的周恩来·····          | ( 1 ) |
| 李连庆 | 大使馆里悼总理·····           | ( 4 ) |
| 董保存 | 一个士兵经历的四五运动·····       | (10)  |
| 赵勇田 | 征集总理手稿·····            | (13)  |
| 赵勇田 | 红岩映红心 总理犹存生·····       | (18)  |
| 赵勇田 | 我心目中的朱德总司令·····        | (22)  |
| 李卫平 | 没有寄回家的立功喜报·····        | (30)  |
| 峭 岩 | 地震营地纪事·····            | (35)  |
| 赵勇田 | 唐山大地震,北京救伤员·····       | (40)  |
| 顾保孜 | 毛泽东的最后瞬间·····          | (44)  |
| 赵勇田 | 国葬十日·····              | (47)  |
| 顾保孜 | 姚文元特别强调“突出集体领导”·····   | (65)  |
| 顾保孜 | “五人照片”·····            | (68)  |
| 顾保孜 | 王洪文的标准照·····           | (71)  |
| 阿 静 | 抓捕“四人帮”·····           | (74)  |
| 赵勇田 | 十月的喜讯·····             | (79)  |
| 顾保孜 | 高原运动·····              | (85)  |
| 成 庶 | 蹲点·····                | (91)  |
| 李连庆 | 独立寒秋:日本松山芭蕾舞剧团在中国····· | (97)  |
| 刘 绳 | 英雄,在苏联驻华使馆前爆炸案中献身····· | (101) |

# 弥留之际的周恩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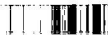
顾保孜

1976 年 1 月 8 日上午周恩来静静地沉睡了，那样安详，那样从容，那样凝重！周恩来解脱了所有的病痛，也解脱了所有插在他身体上的管子。

这之前，周恩来经历了癌症病人最后惨痛离开人间的弥留之



1974 年底，周恩来在 305 医院会见非洲客人。



际,忍受了肌体由生到死被蚕食般吞噬的漫长苦旅。

至今想起仍令人心尖颤抖。

周恩来接受最后一次手术之后,到了 1975 年的 11 月,他已不能自己进食,开始靠鼻饲维持生命。12 月初,不能排便,在腹部安装肠痿。因为多次开刀,腹部溃疡,脓、血、腹水等体液大量渗漏。周恩来浑身插满了管子,红的是血,黄的是脓,无色的是腹水,一些管子将体液排出体外,另一些管子则将鲜血、生理盐水、氧气、流质食物等补充进体内……

仅是这场面已经让人惨不忍睹了。

如果再想想此时周恩来忍受的痛苦,更是令人肝胆俱裂。

周恩来从进医院到生命最后的日子,唯有一次,他实在忍受不了病体剜心般的疼痛,他将他的保健大夫叫到身边,痛苦地说:“张大夫,我实在忍不住疼了,想哼哼,行不行?”张大夫简直忍不住自己的颤抖,“总理,总理,你疼就喊……没关系……怎么样疼得好一些,就怎么样!总理,你别……别再拘束……自己了。”说到这里,泪水已经顺着鼻梁滑落了下来。

这时,止痛针已经不起什么作用了,总理用超常的毅力,硬是咬牙挺着。实在忍不住才小声哼几声。

大凡一个人忍受痛苦到了极点,就会产生一种严肃的力量,使人震惊,使人敬仰!周恩来直到离开这个世界,他留下的仍是宁静的气息和安详的面容。

最后一次手术后,有几天,周恩来有些心神不定,老是不愿意麻烦医生。一天晚上,他对守护身边的警卫秘书老张说:“我的病就这样了,已经很清楚了。我不想再麻烦专家们,他们应该到最需要他们的地方去,为更多的人治病。我想回西花厅,回那里……再治疗……唉,出来两年多了,我真想回去住住啊!”

老张无法用语言回答,只好含泪安慰总理:“等病情稳定了,我们就回家。”身边工作人员都将西花厅称为“家”,这时说出“家”,

除去亲切外更多的是悲伤。总理一旦离去,这个“家”何以完整?何以欢乐?

过了几天,总理不再提回家的事情了。他一向严于克己,知道这个事情让医务人员为难,就打消了这个恋家的念头。

叶剑英在周恩来病危阶段,几乎每天都在医院守着。他叫护理人员手头备一些纸笔,以便总理最后要说些什么,好作记录。叶帅还吩咐专家们尽最大的努力延长总理的生命,哪怕只有一天,或许能让总理临终前听一个好消息,了却他的心愿……。大家都奇怪,什么好消息?叶帅笑笑,不说。可能直到总理逝世,也没有听到好消息传来。究竟怎么回事?至今是个谜!总理最后也没有说一句话,便默默地离去了……



送别总理。

## 大使馆里悼总理

李连庆

总理逝世这个万分不幸的消息，我们是在夜间听到的。天尚未亮，在我们的使馆门前就已云集了大批的日本记者，他们要求接见和采访。



李连庆、潘一凤夫妇在周总理遗像前守灵。

8 点不到,我们打开使馆的大门,请他们进来。记者们向我们提问:中国将如何追悼总理?如何评价总理伟大的一生?总理逝世后中国的内外政策是否会发生变化?对日中关系会有什么影响?对这一系列的问题,我们都作了答复。记者们立刻赶回报社、通讯社、电视台播发消息,有的则继续留下,等候采访前来吊唁的人们。

接着日本政府首相、议长、大臣、各党派首领、各友好团体负责人、各界知名人士,都怀着沉痛和惋惜的心情前来使馆吊唁。田中角荣、三木武夫、福田赳夫、大平正芳、河野谦三、成田知己、佐佐木更三、竹入义胜、藤山爱一郎、中岛健藏、黑田寿男、稻山嘉宽、池田大作、市川诚等和自民党纷纷发表声明和谈话,表达他们对总理逝世的哀悼、感想、看法和对总理一生的评价。他们赞扬总理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亚洲的明灯”、“不论在日本、在国外像周总理这样的大政治家再也没有见过”;“周总理是完全了解战前、战时、战后三个时代的日中两国一切问题的人”、“是日中两国邦交正常化的奠基者”、“是日本的大恩人”;他的逝世是一颗“巨星陨落”、“人类最大的损失”、“世界上失去了一位极其可惜的人物”。

日本的报纸、电视、广播都是以头版、头条、头等新闻进行报道。一连七八天都用大量的篇幅、十分显著的位置和相当长的时间详细刊载和播出日本各界哀悼总理的文章、谈话,从总理青年时代起直到总理逝世为止的各种珍贵的照片。最引人注目的是总理在中日建交的文件上签字后站在人民大会堂里双手稳贴胸前安详慈爱地微笑着的那张照片。有的电视台请总理在日本留学时住过的房子的房东讲述对总理的回忆,并出示他至今珍藏的当年总理亲自签过字的名片。许多报纸撰文歌颂总理为日中关系呕心沥血,作出的巨大贡献。日本的大报之一《日本经济新闻》,在题为《周总理以后的中国与日中关系的课题》的文章中,以缜密谨严的笔法追悼总理的同时,郑重地向读者介绍总理的一生:“从新中国



成立后,总理肩负了四分之一世纪的重任:总理在第二次大战后在国际政治上留下巨大的足迹。从亚洲现代史的角度看来,作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的周总理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霜,其本身就是一部中国革命史。日本由于一衣带水的地理条件,通过两千年的交流和往来,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明治以来的侵华战争所造成的损害,战后长期以来未加处理,直到 1972 年恢复邦交时,才由中国自己提出放弃对日赔偿的要求。在周总理逝世的此时,使人又想起了日本与中国以及亚洲的关系。留学过日本,对日本国民感情有理解并亲自恢复了日中邦交的周总理,未能趁在世之日,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这件事情固然令人痛惜,同时恳切期待这一紧急课题尽早实现。”日本读卖新闻社也评论说:“东西方历史上有不少光辉的英雄形象,但像周总理这样为八亿人民贡献出全副身心的卓越政治家是罕见的。”日本的报纸、电视还大量转载中国和世界各地吊唁总理的活动。据说,日本新闻、电视、广播、评论界报道外国领导人逝世,像这样规模之大、时间之长,乃是第一次。

日本各界送给总理的花圈,全部都是最美好的鲜花做成的,约有五百余个,摆满了使馆的室内室外。日本朋友向使馆发来的追悼总理的唁电唁信有数千封之多。在使馆正式举行总理吊唁仪式的那天,人们从早至晚,川流不息,排成两人一行的长队,走进总理的灵堂。许许多多的人,在总理的遗像面前伫立不走,痛哭失声,在场守灵的中国同志,都为这种场面感动得泪流不止。

日本对总理的悼念,一直持续到 3 月。各地的县知事、日中友好协会、华侨联合会分别或者联合举行追悼会,多者达数千人。2 月 10 日日本 15 个友好团体在东京日比谷公园联合举办《周恩来总理国民追悼会》,有三千人参加。据说这种国民追悼会,只有为那些在日本国内具有极高声望、对日本民族有过重大贡献的人,才举行这种仪式,为外国人举行国民追悼会,更是罕见的。会场布置得十分隆重庄严,灵堂中间悬挂着总理的巨幅画像,画像的前面和

两侧装饰有一丈多高、约数丈宽的全是用鲜花组成的白色花坛。各个友好团体的负责人和友好人士致悼词，日本政府首相、议长、大臣、议员和从外地赶来的县知事、各国驻日使馆代表每人都在总理的遗像前献上一朵白色菊花。

在此期间，日本朋友在欢迎中国代表团或有中国人参加的集会上，每次开始时，主持者都以沉痛的心情先为周总理的逝世表示哀悼，说每当他们看到中国友人时，无法不勾起怀念周总理的悲痛心情。在一次迎接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时，西园寺公一先生在讲话中，竟忍不住痛哭失声。在日本的新年会上，黑田寿男先生沉痛地说：“这是新年会，但大家都由于失去敬爱的周总理而没有过年的心情。”

日本人民为什么这样悼念周总理呢？这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周总理热爱日本人民，日本人民也热爱周总理。

周总理在青年时代就十分重视同日本人民的友谊。他在天津南开中学毕业后，肩负着民族的重托，胸怀革命大志，于1918年东渡日本留学。他在日本写下了多首歌颂日本风景、日本人民和充满革命激情的著名诗篇。他刻苦攻读马列主义，研究中国和日本的历史，研究当时的社会状况，努力追求革命的真理。对于日本的一山一水，尤其勤劳勇敢的日本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后来在同许多的日本朋友谈话中常常问起：“上野公园的那片树木现在还有吗？”“神田的那些旧书店街还保存着吗？”“我是在樱花盛开的时候从神户港上船，回到天津的”。“我也想在樱花开放的时节再去访问一次贵国。”他也曾多次指示我们驻日使馆的同志去看看日本京都的琵琶湖，是不是被污染了。这些谈话，是总理发自内心的对日本人民的感情和热爱。第二次大战后，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世界革命的大局和发展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出发，我们的总理不分昼夜，不问寒暑，会见过数不胜数的日本访华代表团、各界朋友。从首相、议长、大臣、议员、党派首领、社会名流，到

作家、演员、运动员、科学家、新闻记者、工人、农民以及资本家，都同他们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彼此亲切的谈话，友好的交换意见，诚恳的探讨问题，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总理对于日本的青年人，更是循循善诱，有时一谈近十个小时，为他们指出前进的道路；对于工人、农民则耐心启发帮助，坚决支持他们正当斗争；对于作家、演员，多方鼓励他们坚持进步的艺术方向。尤其是对松山芭蕾舞团真是关怀倍至，多次接见谈话，最先肯定由松山树子主演的《白毛女》芭蕾舞，亲自安排松山同中国的《白毛女》电影、歌剧演员会见，同台演出，互相观摩，交流经验，共同提高，使得《白毛女》芭蕾舞日臻完善，在日本和中国演出获得很大的成功。对于运动员



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三木武夫送的花圈放在周总理灵堂两边。

十分关心爱护，特别是对日本的乒乓球运动员像园丁对待花草树木那样的精心爱护。比如对著名运动员松崎君代，总理多次赞扬过她的高超球艺和“胜不骄，败不馁”的良好作风，号召中国运动员向她学习，还请她到家里作客，甚至关心她的婚姻、生育。总理提出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在国际比赛中，更进一步增进了中日两国运动员之间的友谊。对于官方人士、政党首领，坦诚相见，反复申述记取“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教训，珍惜中日两千年的友好历史，共同努力促进中日友好关系的新发展。正是由于总理亲自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使得广大的日本朋友，包括那些曾经敌视过中国的人，也都受到了感动，认清了只有同中国友好，才对日本有利。尤其是1972年，周总理与日本田中角荣首相经过会谈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实现了两国邦交正常化，为中日两国的友谊开辟了新的道路，从此中日两国的友好往来，文化交流、经济贸易、航空交通，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友好城市”、“友好之船”、“友好之翼”……接踵而至。

在周总理逝世时和以后的时间里，许多日本朋友，如现任日本众议院议长保利茂、前任外长小坂善太郎，以及川崎秀二、冈崎嘉平太、古井喜实、黑田寿男、中岛健藏、竹入义胜、安藤彦太郎、松冈洋子、高木健夫、秋冈角荣、河原崎长十郎、松山树子、松崎君代、林慧儿、田所、鲛岛正治、康吾、青木周三、山本忠雄、泽雄子、吉田实、唯，等等，撰写了回忆、怀念、歌颂周总理的文章，表示要学习周总理的伟大精神，坚持中日友好，继承总理遗愿，争取早日缔造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一位年已过百岁的京都清水寺主持大西良庆先生，他曾访问过中国，受到总理的接见，在总理逝世后，也立即命笔，写了一首纪念总理的诗：

“经世利民道在仁，说来说去彻正真。

寒云锁了明星影，远眺西天忆至人。”

# 一个士兵经历的四五运动

董保存

1976 年的 4 月,我还在山西当兵。部队让我到北京出差。无意中我经历了那场政治运动。



1976 年的“天安门事件”。

到北京的当天就听说天安门广场上有很多人在纪念周总理，但因为单位的事情要办，没有顾上去。这并非是不敏感，至今我也不认为我不敏感。我对政治还是很关心的。只是因为那时在山沟里，对北京的消息都是通过听广播看报纸得来的。周总理逝世后，我们总觉得他的葬礼不够隆重，人们的心情有些压抑。特别是毛主席也没有个什么说法，我们团长说，哪怕是有一条最高指示也好哇！

现在天安门发生的事当然不可能广播，也不会见报，我作为一个战士能知道个啥？

可能是4月3日的下午，我办完了事，从天安门经过，在汽车上看到广场上人很多，纪念碑周围全是花圈。到了父亲的办公室，就对他说了。他沉思了一会儿说：“走，咱们去看看。”于是，我们就去了天安门广场。

在我的印象中，那天是阴天，很冷。我们是从广场的西南方向走进广场的。虽然天气很凉，人却很多。广场边的松树林里也全是人，松树上挂满了白花，有人在树上贴诗词，也有人在抄诗词。我们凑过去看了几首诗，只记得其中一首是：“骨灰未寒妖风起，吠日恶犬狂叫急。”我问父亲：“这是什么意思？”他说：“你自己思考。”

纪念碑已经被花圈包围。当我们转到纪念碑的北面时，忽然听到有人鼓掌。循声望去，只见一个人爬到了纪念碑的底座上，把花圈往上放。人们大概是为他的壮举而鼓掌。

我觉得广场上的气氛不对，好像有一种对立的情绪。我还发现不少人是用一种敌视的眼光看着我，如果说不是敌视的话，也是用一种不信任的眼光看着我穿着的绿军裤。这叫我很不自在。也令我感到莫名其妙。

忽然，人们往大会堂的方向涌动，还听到有人在喊着什么。“有坏人在撕诗词！”我听旁边的人说。我对父亲说：“咱们去看一看？”他说：不要凑热闹。他只是和人们一样看花圈上的诗词，还不

时抄着。这时我们身后有闪光灯在亮，回头看是有人在拍照。父亲很警惕地拉起我的手说：“快走吧。”

我跟着父亲离开人头攒动的天安门广场。回家的路上，他对我说：“要出事。”我问，这是怎么了。父亲只是说，你还不懂，就不再说什么。他还说，过一些时候你就会懂的。

说实在话，我当时是想不通的，我天真地认为快清明节了，人们纪念周总理，为什么会有人反对呢？是什么人反他呢？诗词上说的那些人是指谁？

离开北京时，父亲对我说，回部队后不要讲北京的事情，不要给部队的领导找麻烦。我说，说说北京的情况就会找麻烦？他不高兴地说，叫你不要讲，你就别讲！

果然，回到部队的第二天，就广播说天安门发生了“反革命政治事件”。很快又追查谁去过天安门，谁传播过谣言。这时我才理解了父亲那些话的意思和他的那份良苦用心。

## 征集总理手稿

赵勇田

1976 年，周恩来、朱德相继辞世。当 9 月 9 日毛泽东主席逝世、10 月打倒“四人帮”后，从中央至各级政治机关，对征集领袖的手稿，包括文章、文件、电报、批示、书信、诗词、题词原件、以及讲话的原始记录稿等等，给予了高度重视和关注。

11 月 3 日，总参通信部政治部组成征集领袖手稿及革命文物工作小组，成员有 4 人，我当时作为文化科长任这个工作小组的组长。随后，通信部政治部向所属单位发出关于征集领袖手稿的通知，并规定了征集、保管、上送等具体办法。

除发动群众征集这方面的文物外，12 月 2 日，我带两名干事专程赴河北石家庄威州 115 仓库查找原通信兵陈列馆存放的史料中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的手稿和文物。

在威州 115 仓库查看的三个大箱中，找到了三件重要文物：一件是有毛泽东主席亲笔签名的战斗英雄郑起的纪念册，一件是 1950 年毛泽东签署的任命王净等同志任军委通信部部长、副部长、各处正副处长的命令，还有一件是毛主席、朱总司令于 1951 年 11 月 4 日和列席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一届三次会议的解放军、志愿军国庆观礼代表 30 人在中南海的合影照片。

经过几个月的征集工作，在通信兵系统内收集到几百件实物、照片、文电等，根据上级要求分类整理、写出说明词送有关部门。其中有关周恩来的文物有 40 件：题词 1 件、批示文件 24 件、签署



通令 1 件、书面指示 11 件、讲话文稿 2 件、修改建设计划 1 件。

在我分类整理已征集有关周恩来的照片中，有一组周恩来总理视察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的 5 张照片，非常珍贵。

1960 年 12 月 21 日下午 4 时 20 分，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视察了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该校后编入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于 5 时许离校。据通信工程学院政治部宣传处上送材料，当年周总理视察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时，校方曾拍过一些照片，但因为天色已晚，又无闪光灯，所以洗印出来的照片质量不够好，为了深

埋头苦干，鞠躬尽瘁，是人民的勤务员，是吾辈的好模範

吴泽光同志纪念册

一九四七

六九

1947 年 2 月 9 日，周恩来为晋冀鲁豫军区通信联络分局局长吴泽光纪念册题词。